

秦汉虎纹瓦当的谱系发展研究

周海梅（江西财经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涵（江西财经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副教授）

摘要：本文以秦汉时期虎纹瓦当为研究对象，结合潘诺夫斯基图像学方法，从形制演变、图像特征和文化内涵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指出，虎纹瓦当不仅具备结构防护与建筑装饰功能，更承载辟邪、权威与宇宙秩序等多重文化意义。虎纹图像在秦汉时期由写实向程式化、神异化发展，体现了社会信仰、建筑艺术与礼制观念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与观念体系互动机制的理解。

关键词：秦汉瓦当；虎纹瓦当；图像学分析

一、引言

瓦当作为中国古代建筑中独具特色的构件，其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至秦汉达到鼎盛。其不仅能起到保护屋檐、延长建筑寿命的作用，更是屋檐端部的视觉焦点，是建筑装饰的核心。随着建筑技术不断进步，瓦当的形制由早期半圆逐渐演变为圆形，加之社会审美的提升，其装饰性日益增强^[1]。在瓦当的众多动物纹题材中，虎纹瓦当因其鲜明的象征意义和生动的艺术形象备受推崇，它象征着吉祥、勇猛、驱邪。秦汉时期虎纹瓦当广泛流行，展现出写实、程式化、神异化等多种风格，反映了当时审美观念、文化心理、礼仪制度的融合，特别是到了汉代，虎纹和王权、军事、神兽崇拜等文化内涵的结合更加紧密，逐渐成为建筑装饰体系中的重要符号，也成为中国传统图像文化的标志之一。

本文旨在梳理秦汉虎纹瓦当的起源和发展，考察虎纹在建筑构件上的造型变化和技术创新，揭示虎纹作为文化符号隐藏的象征意义。结合考古出土的实物、古籍文献与图像学方法，深入分析虎纹在秦汉建筑艺术中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功能，揭示虎纹瓦当从狩猎文化到宇宙象征的演变过程以及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上的独特价值和历史

意义。

二、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分析

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是西方图像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20 世纪，他提出了三层次图像学分析法，给艺术史、考古图像和符号解读带来了完整的方法论框架。潘诺夫斯基的理论在研究中国西汉动物纹饰，尤其是虎纹图像时，既有学术价值，也具有很强的实证意义。这个方法强调图像的意义不只停留在表面，而是通过对形式、内容和深层文化逐步分析，逐层揭示作品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含义^[2]。

（一）前图像志描述

第一层为前图像志描述（pre-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即对图像做最基本、最直接的分析。这一层侧重对虎纹瓦当实物中的虎纹图案进行全面地识别和分类，分析其造型特点、装饰手法、工艺细节与构图方式等。例如，对虎纹造型的 S 形弯曲、回首顾盼、张口露齿等动作细节、线条的处理，甚至纹路刻画的写实细致程度，同时还需通过同类器物、同期地域实物的对比，梳理虎纹形象演变的历史脉络^[3-4]。这一阶段的描述性分析为后续的意义解读、文化诠释提供形态学的描述依据，也是科学研究的基础环节。

（二）图像志分析

第二层为图像志分析（iconographical analysis）。这个阶段是借助古文献、考古报告和出土器物，深入挖掘虎纹的主题意义和象征内涵。例如，汉代的虎纹与避邪、守护、威权等观念密切相关，还与王权、军权甚至四灵体系中的符号有着复杂的联系。通过《山海经》《淮南子》《风俗通》等典籍，以及大量考古材料，可分析虎纹在动物学、神兽演化、礼仪制度、宇宙观等领域中的定位。在此层面上，虎纹已不仅是装饰性图案，更成为理解秦汉政治、宗教和礼仪的关键线索。

（三）图像学解释

第三层为图像学解释（iconological interpretation），追问的是虎纹背后更深层的文化和集体精神。按照潘诺夫斯基的理论，研究者需将虎纹置于整个时代的思想、宗教信仰、宇宙观和民族心理之中，去透视其折射出的文化精神和社会面貌。例如，汉代的虎纹不仅是避邪象征，更承载着灵魂升天、天人合一、正统权威与等级次序的深层含义。通过深入的图像学解释，可以理解虎纹如何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礼制系统中不断转化，并由此获得新功能和意义。这一层理论也有助于揭示虎纹图案如何受到中原与外来文化的互动影响，以及“制器尚象”理念如何推动其变化。

因此，潘诺夫斯基的三层次分析能系统揭示汉代虎纹等动物形象的生成逻辑、象征方式和文化意义。结合考古学、符号学、文化人类学等多种学科方法，能立体地勾勒出秦汉时期动物纹饰“形一意一理”的多重结构。现代图像学的发展，让这套理论不仅成为美术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成为分析不同文化、不同学科的有力工具，为中国古代动物图像和虎纹研究拓展了新的理论和实践空间。

三、瓦当的功能性与结构

（一）瓦当的建筑用途及意义

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屋面系统中的关键构件，

从建筑材料与构造角度看，“瓦当即筒型檐瓦的末端”，位于檐口最外缘，是屋面排水与构件防护链条中的终端部位。其最直接、最基础的功能在于保护檐部构件；瓦当“起着保护椽头引流隔水免受侵蚀的重要作用”，其“最主要的作用是为了保护檐椽免受风吹雨打的损坏与侵蚀”。由此可见，瓦当并非单纯的装饰物，而是以结构性的“封口”方式参与屋面防护与排水组织，兼具导流、隔水、减缓雨蚀等实用意义。在满足防护功能的前提下，瓦当进一步发展出显著的审美与象征属性。在设计层面，瓦当巧妙地将纹饰内容和有限的圆形布局融为一体，不同纹饰图案赋予瓦当重要的建筑装饰作用，使其成为具有设计价值与审美价值”的艺术形态，并在当面图像中凝结时代审美观念与造物智慧。正因瓦当位于建筑檐口最醒目、重复出现的视觉位置，它天然具备“装饰—传播”的双重优势。同一建筑群往往连续铺设瓦当，其纹饰将形成强烈的节奏感与秩序感，成为建筑对外展示等级、风格与文化观念的界面。从虎纹设计与功能性的关联来看，虎纹瓦当恰好体现了瓦当实用性与艺术符号有机统一的特征。

（二）瓦当的形制与规格

至于瓦当的形制，直接关系到虎纹布局 and 表现效果。瓦当起源于战国，到了秦汉，发展得极为多样，各种变种不断涌现^[5]。秦汉瓦当主要有半圆和圆两种，河南地区尤其可以见到两种形制并存^[6]。半圆到圆的转变非常关键，因为这一步意味着图像组织空间被彻底打开，纹饰布局更灵活，也推动了高水平的虎纹精品不断出现，如图1所示。



图1 虎纹半圆瓦当（左）与虎纹贴面半圆瓦当（右）

圆形瓦当的广泛使用，让装饰构图更容易展

现对称、均衡，节奏的美感。圆本身是个天然的几何基础图形，中心对称、轴线众多，为花纹和纹样的排列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不论是复杂的艺术图案，还是自然主题的装饰，都能在圆面瓦当上找到合适的位置。对虎纹来说，这些常见的“回首奔跑”“尾部卷曲”“身体沿边弯折”的造型，其实都源自对圆形空间的适应，不是随意创作，而是受制于几何边界的主动选择。

瓦当的规格和结构影响着花纹细节。有些地区的瓦当当面会加乳钉等装饰，这直接影响画面重心和空间分配^[7]。设计虎纹时，必须围绕或避开中心构件，重新安排身体和四肢的布局，让图案保持整体均衡。如果瓦当中央有装饰，虎身的弯折、四肢的伸展、尾部的卷曲其实都在填补空间、平衡重心，让画面既展现出张力又回到一种有序的状态。

四、虎纹的起源与演变

（一）虎纹的文化起源

虎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被尊为“百兽之王”，亦被视作“山神”一类的自然神灵象征。虎纹发源于商周时期，至秦汉阶段进一步完成观念与形象的体系化，尤其是“白虎”被纳入四神/四灵瓦当，成为具有明确方位属性的神兽符号。在文献记载层面，《风俗通》以“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概括虎的属性，虎被归入阳物，具备镇慑与辟除不祥的力量，因此“谓可辟恶”。民间对虎“阳刚之气”的理解被扩展为一套现实功用性想象，即辟邪驱鬼、消灾病、保平安。此类观念是虎纹从图像装饰走向护佑性符号的关键思想基础。

在更早的文化来源上，虎纹起源于原始艺术，是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文化转变而来的。这一判断将虎纹的发生机制解释为由氏族一部落社会对“保护神”的祭拜活动出发，虎形象既可作为部落名称，也可进入身体与居所的标识系统，如门饰、身饰。《淮南子》中“西方金也，其兽白虎”，

则为秦汉时期将虎神格化、制度化提供了思想资源。虎从猛兽进一步被整合进宇宙观与方位观之中，进而获得可被官方礼制与建筑装饰吸纳的合法性。商代甲骨文“虎”字的造型特征，为“早期虎形象的威慑性来源”提供了补充证据：虎口大开、牙齿锋利、尾部强劲，整体呈现威猛凶悍之态，并被解释为体现了权力至上的社会意识。这表明虎纹在进入瓦当体系之前，已具备“力量/权威”的视觉语法与政治联想。

（二）形式与符号意义

秦汉瓦当上的虎纹，一方面延续了辟恶护佑的传统功能，另一方面通过瓦当这一高度程式化的建筑构件，形成适应圆形界面的图像结构规律。虎象征勇猛，也是威严和力量的象征；其形象多与战争有关，并指出古代以虎形物件作为出兵的信物。这意味着虎纹在秦汉语境中同时承担两套意义系统，即民间层面的祈福避灾与国家层面的权力——军事象征。



图2 虎纹瓦当题材类型及复合表现

从题材上看，虎纹瓦当绝不止单一形态，还形成了丰富的主题系统。有单虎出现的“奔虎纹瓦当”“虎纹瓦当”，也有多元组合如“奔虎逐

雁纹”“奔虎食猪纹”，更发展出“翼虎纹”“白虎纹”“龙虎纹”“龙虎蟾蜍纹”等神兽和复合表现^[8]，如图2所示。从虎和犬鱼组合，到龙虎蟾蜍，这些意象往往意味着吉祥，都是通过猛兽的威势，来表达祛邪压灾、守护秩序的文化主题。

在形式语言上，虎体为适应瓦当圆形构图而进行的弯曲与变形：尾部常卷成“C”形或“S”形，身体自然向下蜷曲以适应当面，四肢外张，强调奔跑、回首、张口等高动势瞬间，如图3所示。这类处理让虎纹在有限圆面上获得充沛张力，也使勇猛、威慑的象征意义通过动态得以视觉化、情境化呈现^[9]。



图3 白虎纹瓦当造型与动势

白虎纹的符号意义则更偏向制度化宇宙观，它既是西方神的代表，又在“四神”体系中被赋予方位、五行等复合语义，从而使虎纹从一般“辟邪兽”提升为可与礼制、天文、方位观念相衔接的国家化图像。

（三）虎纹的谱系分析

本研究将秦汉虎纹瓦当的发展脉络梳理成三条线，即题材层级的扩展、造型风格的分化以及符号体系的制度化。第一，题材层级的扩展。虎纹最初以单体虎形象出现，后逐渐发展出故事性和复合性。例如，“奔虎纹”着重强调猛虎的力量感和压迫感；再到“奔虎逐雁”“奔虎食猪”，直接赋予虎追猎和捕食的剧情，虎的攻击性和速度感一下子强化了。至“双虎纹”，画面中出现了母子依附关系，并添加了羽翼装饰，这实际上标志着虎形象开始向神异的方向演变。此外，“龙虎纹”“龙虎蟾蜍纹”中虎和龙并列甚至融合，加之云气元素的介入，全都卷入更宏大的神话体系和

祥瑞故事之中。

第二，造型风格呈现由写实到程式并存的分化。动物纹瓦当早期以写实为主，与秦早期草原狩猎生活相关；秦汉又发展出频繁出现的程式化构图，如对称、成组、太极爻对称等。虎纹在这一框架中表现出秦代虎纹形态逼真写实；而汉代虎纹在四爪、尾巴等细部较秦代更为细腻，运动感更强，并出现瓦心装饰。换言之，虎纹从秦到汉的演变并非简单从写实到装饰，而是写实能力提升的同时，构图程式化程度也有所增强。

第三，符号体系从“虎”走向“白虎”的制度化。虎的形态有怒目张口、向前奔驰、背有双飞舞/双翼等，规格有当径17—21厘米、轮宽1.5—2厘米等尺寸以及是否有乳钉。白虎纹可能具有较明确的区域类型与形制分式，一类为常见怒目奔行式，一类为翼虎式，还有水平翻转的少见变体，如图4所示。其背后反映的是白虎作为“四神”符号进入瓦当装饰后，逐步形成可识别的图像范式，并在不同地点与工坊系统中出现局部变体与再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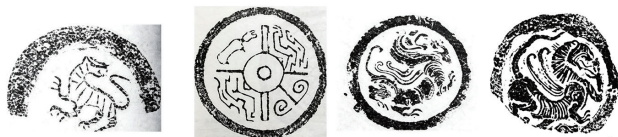


图4 虎纹形态类型

五、秦汉时期的虎纹瓦当

（一）虎纹瓦当的艺术表现

秦汉时期的虎纹瓦当，艺术表现鲜明，主要表现在动势、圆形构图、细部刻画、和复杂叙事四个方面。一是动势，这类瓦当最讲究瞬间动作，如“奔”“回首”“张口”。例如，“奔虎纹瓦当”中猛虎昂着头，嘴巴大开，回头瞭望，四肢向前冲，整个画面都带着速度感。再如，有些虎准备捕食，爪子伸出去，头回望，弓起身，这些姿势让虎看上去蓄势待发。二是圆形构图，这也是瓦

当设计的一大特色。工匠让虎的身体弯曲，尾巴卷曲，专门适配瓦当的圆形空间，尾巴卷成“C”或“S”形，既填补了圆的边缘，又让画面具有节奏感，视觉重心稳定，从圆心到边缘都呼应得很紧凑。三是细节刻画，汉代作品明显比秦代更讲究，秦代虎纹写实传神，汉代则将爪子、尾巴等细节刻画得更细腻，并加强运动感，有时在瓦心加些乳钉装饰。例如，白虎瓦当，虎口大张，獠牙分明，虎身纹路特别精细，身体弯成弧度贴合瓦当中心，画面和谐又精致。四是复杂叙事和神异化，这让题材更有张力。如“奔虎逐雁”“奔虎食猪”等瓦当，画面上虎在追逐或捕食，故事性突出；“翼虎纹”则通过添加翅膀、鬃毛，将虎异化成神兽。而“龙虎蟠螭纹”将虎纳入复杂的祥瑞结构，采用中心对称构图，搭配云气、呼风唤雨等观念元素，形成极具符号化的装饰体系。

（二）社会信仰与虎纹的关联

虎纹瓦当的流行，与秦汉时期的社会信仰结构具有对应关系，一是辟邪禳灾的民间信念，二是权力、军事象征的国家叙事，三是宇宙方位观的制度化信仰。“虎者阳物…可辟恶”具有阳刚之气，被当时的人们认为能够辟邪驱鬼、消灾病、保佑平安，直接指向虎纹在民间层面的护佑功能。瓦当位于建筑檐部，是人们日常可见的界面，将虎纹布置于此，相当于把护宅、避祟的象征长期固定在建筑外部边界上，使辟邪观念具备持续性与可视性。在政治与军事语境中，虎多与战争有关，虎形物件可作出兵的信物。这使虎纹不仅是装饰，也可能成为权力秩序的视觉宣示，虎的威势可与“镇慑、威仪、权力”形成互文。商代甲骨文虎形象体现权力至上社会的说法，也可视作虎纹在更长时段内始终与权力象征保持联系的证据链之一。而当虎被提升为“白虎”并进入“四神”系统后，其信仰意义进一步制度化。《淮南子》关于“西方金—白虎”的关联，使白虎纹不再仅仅是辟邪图像，更成为方位—五行—天象秩

序的可视化符号。白虎瓦当在造型上融入翼、鬃毛、云气化倾向，正体现了从现实猛兽到神圣护法转译过程。

（三）功能与象征的结合

瓦当本为建筑构件，具有保护椽头、引流隔水等实用属性，但秦汉瓦当同时承担突出的装饰与象征功能。虎纹瓦当正是实用性与象征性统一的典型，它以稳定的圆面结构服务于构件功能，又通过强烈的图像符号承载护佑、威慑与秩序宣示。从构图机制看，虎体弯曲、尾部卷曲等处理，不仅是艺术选择，也是对瓦当圆形界面与边轮空间的“因器施纹”适配；从象征机制看，虎纹题材将“勇猛、威严、辟邪”的观念固定在建筑边界位置，使建筑获得一种“被守护/可镇慑”的外观语义。尤其在白虎、龙虎等复合题材中，象征体系更为集中：白虎标示西方与金德秩序，龙虎组合可与“云从龙，风从虎”的观念互通，而龙虎蟠螭进一步叠加了呼风唤雨、祈福避灾的意义层。

六、建筑、礼俗与文化背景

（一）建筑演变与虎纹的应用

到了秦汉，瓦当经历了从成熟到极盛的发展过程。瓦当开始在建筑上广泛普及和标准化，给虎纹等动物题材提供了载体。随着建筑越盖越大、屋顶结构趋于复杂，瓦当的用量、制作标准、花纹装饰的需求也随之提升。虎纹因辨识度高，且兼具护佑寓意，非常适合成为檐端的装饰主题。在样式上，秦汉瓦当的图案呈现出里程碑式特征，对称式、成组式的排列最常见。这实际上回应了建筑构件批量生产和统一视觉秩序的需要——同一组建筑檐端常见排列整齐的虎纹，如“四虎对称”半瓦当，使整个建筑的威仪感和等级感得以彰显。汉代虎纹又呈现新变化：线条更细腻，运动感加重，瓦心常增加装饰。这些细节正是建筑对视觉冲击力要求提高后，工艺水平和审美追求共同推进的结果。檐端作为建筑最吸引目光的部

分，其图像必须清晰、动感强，才能在远观时产生强烈的视觉震撼。

（二）文化交流与风尚

秦汉社会在文化上呈现兼收并蓄的特征，瓦当装饰亦表现出题材的扩展与风格的多样化。虎纹作为核心动物符号，在这一时期与多种观念系统发生复合化互动，与四神信仰结合生成白虎纹；与龙的神话象征结合生成龙虎纹、龙虎蟠螭纹；与云气、风雨观念相联系，使虎纹从单一猛兽意象进入更复杂的祥瑞语境。此外，动物纹多汲取自“狩猎社会”的飞禽猛兽灵感，这表明虎纹的流行亦与社会生活经验、尚武气质及猎猎想象有关；而由单一动物纹逐渐向多种动物纹变化则说明装饰风尚在汉代趋于丰富与叙事化。虎纹不再只是“一个虎”，而是进入追逐、捕食、对峙、对称组合、与神兽同构等多种视觉组织方式。总体而言，虎纹瓦当在秦汉并非孤立符号，而是在建筑审美、礼俗信仰、宇宙观秩序以及装饰风尚变化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写实与程式并存、威慑与吉祥同构、单体与复合共生”的文化图像系统。

七、结论

本文围绕秦汉时期虎纹瓦当展开讨论，从瓦当这一具体建筑构件入手，梳理其形制、功能与纹样图像。综合材料形态、图像特征、文化语境来看，虎纹瓦当不只是装饰品。它有“保护檐椽、引流隔水”的实际功能，更承担辟邪护佑、权力象征、宇宙秩序这种复杂文化意义。在图像方面，随着瓦当从半圆发展到圆形，虎纹获得更大的构图空间。奔跑、回首、卷尾等姿势被有意识调整，形成一套适应圆形瓦当的图像语言。题材上，从单一奔虎、到奔虎逐雁、奔虎食猪等叙事组合，再到翼虎、白虎、龙虎蟠螭等神异化形式，完整展现虎纹从现实动物到神兽符号的演变轨迹。文化意义上，虎纹一直延续自商周的“百兽之长”权威象征。它和辟邪禳灾的民间观念、尚武精神、军权标志交融。进入汉代，白虎被纳入“四神”

体系，赋予方位和五行属性，虎纹从民间护符升格为王权、礼制、宇宙观的制度化符号。瓦当檐口层层叠叠铺着虎纹，也成了可视化的护宅和彰显威权的界面。

总的来看，秦汉虎纹瓦当是实用构件、美术造型，甚至观念象征三者的紧密结合。通过梳理其形制、图案与象征意义，能发现从狩猎文化到宇宙神兽，虎纹有一条清晰的谱系。由此，我们不只是看到了图像演变，更能切身体会秦汉时期建筑美学、社会信仰和图像系统之间的深度互动。

参考文献

- [1] 张博. 汉代瓦当装饰图案的文化内涵分析[J]. 收藏与投资, 2025, 16(1): 97-99.
- [2] 刘伟冬. 西方艺术史研究中的图像学概念、内涵、谱系及其在中国学界的传播[J]. 新美术, 2013, 34(3): 36-54.
- [3] 俞欣悦. 陕西地区秦汉瓦当动物纹饰的形式美学研究[J]. 大众文艺, 2024(17): 55-57.
- [4] 莫惠雯. 岭南地区与陕西地区秦汉时期瓦当纹样对比研究[J]. 收藏与投资, 2023, 14(9): 51-53.
- [5] 马茉莉, 史鹏. 秦汉时期动物纹瓦当的装饰审美[J]. 炎黄地理, 2021(10): 72-74.
- [6] 梁惠娥, 孙弋人. 秦汉时期动物纹瓦当的装饰审美分析[J]. 美术大观, 2014(12): 62-63.
- [7] 钟国胜. 秦汉瓦当纹饰与阴阳思想[C]//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设计科学学会(ISDS),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 上海地产闵行集团. 东方设计学研究——第三届东方设计论坛暨2017一带一路与东方设计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出版者不详], 2017: 604-613.
- [8] 耿庆刚. 秦雍城动物纹瓦当主题研究[J]. 考古与文物, 2019(5): 71-77.
- [9] 孟卫东. 汉代瓦当的形式构成美[J]. 文艺研究, 2010(11): 153-154.